

## 35.

# 中国过去的未来在哪里？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有些词语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太容易使用这些词语了。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过去意味着什么，然而事实上，“过去”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一些深刻的分歧，而这些分歧本身就属历史。作为我们身后正在进行的事情的过去，与作为某一日期或时期之前的一切事情的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一日期或时期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某个较老版本的“现在”，而这个“现在”本身也在成为历史，即使过去已经无法改变。这种对过去的彻底终结是现代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对过去的终结现在已经形成惯例，甚至被赋予独特的字眼：“前现代”。

关于现代性究竟何时产生，就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有人指是始于18世纪晚期的德国思想家，亦有人说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或1920年代。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以结合坚信和讽刺的独特方式，说出一句名言：“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变了。”（《班尼特先生和布朗夫人》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年）事情的核心是一种有问题的说法，即在某一时间点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中国沿袭现代性侵犯历史的思想，并以特有的精确性使之成为惯例，允许留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于是，“近代”始于鸦片战争，而现代则始于1919年5月4日（描述比吴尔夫所说还要精确）。对历史的侵犯，建构了一个不顾史实的“传统中国”，

形成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基本上一样的奇特信念。展示18世纪的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深刻差异，是一件简单而平庸的事情。然而，我们也很容易能证明18世纪的中国社会在非常基本的方面，远比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社会更接近现代中国社会。前一种说法是信仰问题，而后者却招致惊讶和怀疑。

中国人最常用来指留存至今的封闭过去文化的词语是“遗产”(heritage)。这是个旧词汇，现在用“inheritance”，让接受者不只是局限于家庭继承人，还延伸至整个汉族。每一笔遗产都意味着一种排斥；在“遗产”的这种延伸意义上，被排除在外的是非汉族人。涉及其他东亚民族时，这一点尤其令人饶有兴趣，因为这些民族的精英阶层曾一度认为这种被接受的文化也是他们的一实际上，比起汉族平民，他们更像是这些文化的所有者。这种文化财富的现代再分配，显然是通过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这一媒介，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校制度，形成民族认同的计划的一部分。以前将人口中的一个小群体与其他汉族人区分开来的文化财富，都不分阶级、性别或地区的分配给整个民族。随便一个会背十几首唐诗的汉人，都比任何一个外国学者更能理解唐诗，因为它们是汉人承传下来的文化财富——这个目前是一个信念的问题。一千多年来的语音、语义和文化变化带来的深刻差异是不重要的；这些诗歌是代代背诵的传家宝，赋予了人们身份。

遗产意味着死亡和终结，这是上文提到的关于“过去”的第二个概念。它确实是传家宝，而不是资本，只能一成不变地保存。它被视为是已知的东西，不容正经八本地重新诠释——除非又从地下发掘出什么东西（或者从黑市上买来希望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东西）。在这种“传家宝”体制下，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是对熟悉问题的重新演绎，或者是对文化档案馆里不为人知的角落进行细微探索。学术研究变成保障传家宝之地位的工具，提供更详细的民族历史，而不是对它提出问题。

如果说西方预示的灾难性现代性（“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变了。”），是中国现代/当代建构前现代的第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来自前现代中国本身—更具体来说，来自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这是假设较早以前和稍后时期的过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任何声称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发生根本变化的说法，总会引发这样的回应：任何大家希望发生的变化早就已经存在了。

在小部分中国人口生活的地方出现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媒介，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界定的产品—“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各种形式的包装供应国内消费，并通过国家大力支持的“孔子学院”进入出口市场。

在中国，有非常聪明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对新思想的到来感到兴奋。他们组成研究小组。但是，当他们授课时，却被要求教授标准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所讲述的都是相同的内容，而他们却已经不再相信这些。在公共场合，他们通常不会谈论私下讨论的新想法。他们不会引用—或许不敢引用—其显然一直在阅读的内容。

我不想把形势描绘得太严峻，也不是说这种情况是中国特有的。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教授民族文化的国立学校系统中也很常见。美国的州立大学有时也要与立法机关争斗以维护学术自由。州政府支付学校的大量费用，而且它知道自己想要学校教什么。

那么，中国“过去”的未来在哪里？我看是在由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组成的学习小组、学术文化的边缘，以及学术圈外的爱好者当中。他们使当代中国充满活力的前卫文化、同样充满活力的流行网络文化，以及学术文化的保守主义（尤其是高级和男性学者）的文化融合变得更加复杂。只是通过出版书籍，中国以外的学者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们的书有时会出

现在中国书店里海外区域的书架上一被标为“海外学者”部分——但这些书架似乎比摆放着中国学者的书的大量书架更能吸引购书者。当我们与那些研究生、年轻教师和学术爱好者交谈时，我们才能真正对话，而这些对话都是在正式的学术场合上不会出现的。

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条古老的原则：“变通”。就是说通过改变，使某事物得以通过，取得成功，并延续下去。“通”的反义词是“塞”，意即阻塞、停滞。这就是现在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的理解。对中国文化的过去进行严肃的批判性反思——改变我们的理解——是我们可以从学界的边缘地带和学术爱好者中所期待的。如果一个人能用新角度仔细观察传统，它就会是一个明智和令人兴奋的传统。文献和文物可以从大量的旧框框中拯救出来。这些并非“传家宝”。

1960—1970年代的欧美思想是令人兴奋的，并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理解世界有深远的（即使并非总是公认的）影响。这些思想家大多是阅读二手摘要，而不是原著。很少人意识到，他们最杰出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通过重读过去的思想家——如柏拉图（Plato）、卢梭（Rousseau）、黑格尔（Hegel）、巴尔扎克（Balzac）等——的著作。这并非是固定不变和崇拜的过去，而是我们再次谈及现在的严肃思想时，就像是食物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这就是过去可以做到的：变通。

这就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我不知道年轻的中国学者在这样一种批判的眼光下会发现什么，但它不是关于固定不变且本质化的“传统中国”或西方思想的成见，包括带有中国色彩的后殖民思想。我不相信当代学术界的老生常谈，即当我们阅读过去时，我们发现的只是自己。我们是变化中的自己；我们不断学习和改变。